

“过去，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降落伞能否打开，全靠自己。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5年前，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从纸艺结构设计、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只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 OPC 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 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 OPC 创业者们一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创业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 AI 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 OPC 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 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 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 AI 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 9 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 AI 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渝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浙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 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 OPC 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 AI 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 OPC 实践者的重

AI 时代，大学生开始“一人创业”

■本报记者 孟凌霄



① 沈星彤展示手工制作立体书。



② 何泽渝在 2026 第一期苏州高级技术经理人 OPC 班上分享 OPC 项目。



③ 袁文杰在校内分享 OPC 项目。

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 3D 数字人直播和 AI 模特技术，打造 AI 虚拟试衣与时尚分析平台，并创立了“苏州不赖”公司。这一实践让他更认同 OPC 理念：只要善用 AI 工具，“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支队伍”。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 OPC 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渝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

很多 AI 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 0 到 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 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 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渝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 OPC 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渝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

很多 AI 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② 何泽渝在 2026 第一期苏州高级技术经理人 OPC 班上分享 OPC 项目。



③ 袁文杰在校内分享 OPC 项目。

很多 AI 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 0 到 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 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 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渝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 OPC 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渝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

很多 AI 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 0 到 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 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 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渝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 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对苏州大学的 OPC 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 2024 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 AI 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 70% 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 9 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 AI 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 AI 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 OPC 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 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 AI 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 AI 前沿技术，培育 AI 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 OPC 社区，开展了“Aldea”校园 OPC 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不赖”等一批早期 OPC 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OPC 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 119 所高校和苏州 1013 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 OPC 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 OPC 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 10 亿元“青创基金”，其中 1 亿元“青创基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 1000 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 6000 多名教师、5 万多名学生、50 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教务处副处长张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张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 OPC 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 6 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程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 OPC 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

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OPC 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 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 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张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 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 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 and 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渝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 2000 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 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等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 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 AI 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 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 OPC 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 SUDA 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校园会客厅”。在创新创业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不亿元“青创基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园，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秀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早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张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 2028 年新增 OPC 企业 1000 家，集聚 OPC 人才超过 1 万名。未来，苏州大学 OPC 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 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学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 OPC 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河北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保利：

人工智能时代，专业选择更应“兴趣为先”

■本报记者 陈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表示，2025 年，中国传媒大学一共“砍掉”了翻译、摄影等 16 个本科专业和方向。此番言论引发公众对于高校专业调整的关注。

近几年，国内高校大幅度调整专业的消息常见诸媒体。比如 2024 年，四川大学裁撤专业 31 个；2025 年，华东师范大学停招专业 24 个；2023 年至 2024 年，山东大学撤销以及暂停招生的专业达 37 个。相比之下，中国传媒大学此次公布的专业调整数量并不算多。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单元，专业结构的稳定性对于高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此前多年，国内高校的专业总体较为稳定，但近年来为何频繁调整专业？在此背景下，学生选择专业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中国科学报》专访了长期从事高校专业问题研究的河北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保利。

专业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全国高校在专业调整，如撤销、新增和合并专业方面，整体呈现何种趋势？

胡保利：可以说，最近两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校专业调整范围和力度最大的一段时间。2023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改革方案》。此后的两年间，我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 3715 个，撤销和停招 6638 个；高职新增专业点 1.2 万个，撤销专业点 8200 余个。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仅在 2024 年，国内高校就撤销了 1428 个专业点，停招的专业点更是达到了 2220 个。相比之下，2014 年全国高校撤销的本科专业点仅为 57 个。

《中国科学报》：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波高校专业调整热潮？

胡保利：此轮专业调整背后的驱动力，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推动，特别是《改革方案》提出，到 2025 年优化调整高校 20% 左右学科专业布点的目标后，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对于高校的专业调整都进行了政策倡导，这就为高校专业调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另一方面，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于高校原有的专业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

高校进行专业调整，无论是撤销专业还是新增专业，都会涉及大量组织结构层面的调整与重新布局。比如，撤销专业时要考虑原专业教师的安置问题；新增专业则要考虑引入新教师，添置教学实验场地、设备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办学层次高的公办高校对于专业调整天然具有一定的“惰性”。这也是此前多年，国内高校专业调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只有当内外部压力达到一定程度，高

校意识到必须通过专业调整来适应发展趋势时，才会下定决心对专业“开刀”。目前来看，这一时机已经到来。

专业生死，由谁来定

《中国科学报》：高校决定撤销或新增某个专业时，通常会参考哪些核心指标？专业的去留是否可以由高校自主决定？

胡保利：在决定撤销或新增某专业时，高校会综合参考多方面指标。其中，招生与生源情况是最直观的判断依据，主要体现在专业连续多年的第一志愿率、录取分数等。此外，就业与社会需求也是决定性因素，连续两到三年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对口就业率低的专业会被优先撤销。

新增专业则需贴合国家及区域战略需求，通常会聚焦国家急需领域和地方产业缺口，同时也依托学校原有的优势学科群，并核算资源投入与成本效益。

此外，教育部专业评估结果、年度监测数据及政策红线，也会对专业的撤销与新增形成硬约束，确保专业调整贴合教育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

至于自主权问题，目前高校在专业调整中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但仍需履行相应程序，并遵守相关规则。比如，在专业撤销过程中，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和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等机构都会发挥作用，学校教务处还要对相关专业进行摸底，拿到准确的指标和数据，并与相关学

院交换意见，协调专业裁撤的后续问题，如相关教师的安置、学生的分流等。因此，专业的裁撤与新增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需要经过规范程序。

《中国科学报》：很多高校在保留某些落后专业时，往往会将教师的安置问题作为其相关决定的重要理由。对此，你怎么看？

胡保利：被裁撤专业的教师如何安置，这对于高校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高校应该高度关注被裁撤专业的教师职业发展问题，被裁撤专业的教师也应积极主动面对客观现实。

事实上，在被裁撤专业教师的出路问题上，高校有很多选择。可以安排部分专业的教师从事基础课教学或全校的通选课教学，也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所长成立专项的综合研究机构，或者将教师调到其他学院。例如，外语学院教师在其所教授语种被裁撤后，进入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需要引起高校重视的并不是教师没有出路，而是在教师分明有出路的前提下，某些高校在进行专业调整时忽视教师权利，或者没有意识到教师出路问题对教师个人乃至教师队伍整体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导致部分教师难以施展自身才能。

兴趣为先，优先“大类”

《中国科学报》：未来几年，你认为高校专业调整的广度以及范围还会这么大吗？

胡保利：从长期来看，高校专业调整在频次和幅度方面将有所收缩，但伴随 AI 技术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以及未来国内整体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态势的不断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仍会呈现快速变化的态势。因此，从回应社会需求的角度看，高校专业的动态调整肯定是长期趋势。在这方面，高校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科学报》：在此情况下，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胡保利：对于几乎所有的专业而言，未来 AI 技术的发展都会改变其知识传授的重心。在这一前提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变得更加重要，而决定学习主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学生自身对于所学专业领域是否有足够的兴趣。

从这一角度看，在 AI 时代，学生在进行专业选择时，应更加贯彻“兴趣为先”的原则。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目前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往往难以拥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身学科兴趣，这就导致他们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往往不知道自己兴趣点在哪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未来专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使得所谓“热门”专业与“非热门”专业的界限不再如以往那样清晰。因此，学生在选择专业时，没有必要“极端化”，即一定要选一个所谓的“热门”专业，应该更加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社会需要。

经过一系列的专业调整后，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绝大部分专业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只要认真学习，大多数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基于上述认识，在选择专业时，学生首先要选择自身感兴趣的专业大类方向；选择具体高校时，可在相同层次的高校中，优先选择那些在该专业方向上施行大类招生的高校。此类高校在学生入校之初是不分具体专业的，这一做法更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具体的专业学习前有更多时间明确自身兴趣所在，从而减少“人错行”的概率。